

最近，我到莫斯科参加俄罗斯“中国年”俄文新闻报道奖评选活动，认识了俄罗斯著名记者、中国问题专家欧福钦。

在两国元首的推动下，去年在中国举办的“俄罗斯年”活动十分成功，今年在俄罗斯举办的“中国年”活动也同样精彩纷呈。俄罗斯新闻界对“中国年”活动和俄中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立体式报道，有力地促进了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按照去年的做法，中国记者协会和俄新社在莫斯科举行“中国年”俄文新闻报道奖评选。我作为中方评委参加了这次评选活动。

俄方五名评委中有一位个子高高、鹤发童颜的耄耋老人格外引人注

## 初识欧福钦

祝寿臣

目，他叫弗谢沃洛德·奥夫钦尼科夫，中文名字叫欧福钦。

经过两天的认真评选，评出了政治、经济、文化类一、二、三等奖，欧福钦以其刊载在《俄罗斯报》上的题为《中国的腾飞与俄罗斯的未来》一文获得特别奖。

欧福钦，生于1926年，曾长期在中国工作和生活。1953年至1959年任《真理报》驻中国记者。1992年至1996年以俄罗斯专家身份在新华社工作，曾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欧福钦现任俄联邦政府机关报《俄罗斯报》政治评论员，俄中世纪和平友好委员会理事。

欧福钦以接触过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而自豪。他说，他的中文名字“欧福钦”就是周恩来总理给他起的，至今他仍然很高兴人们用这个汉语名字称呼他。他回忆说，50年前，他刚到北京工作时，那里只有12名外国大使和14名外国记者，所以中国每次举行国宴他们都是被邀请的对象。这就给了他们近距离接触中国领导人的机会。

当我问他在的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是1956年见到毛泽东主席。那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欧福钦被《真理报》指派负责对大会进行报道。大会结束后，毛主席专程来到记者休息室，进屋就问：“哪一个是《真理报》的



记者？”欧福钦当即站起来说：“我就是。”毛主席过来握着他的手说：“辛苦了！辛苦了！”

欧福钦说，同周总理见面的机会更多些。但有一次在参加周总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曾提了一个愚蠢的问题：“中国什么时候加入联合国？”周总理答道：“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现在，蒋介石集团把持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不是中国何时加入的问题，而是何时恢复中国席位的问题。”欧福钦至今还对此感到很懊悔。

欧福钦高兴地谈道，他在青年时代就同江泽民有过接触。那是1956年，他和江泽民都是30岁。他去长春汽车厂采访，提出想采访几位在苏联留过学或者进修过的人。厂方推荐了三个人，其中就有江泽民。第二次会面是在江泽民当选总书记之后。欧福钦说，我是在他当选总书记之后，第一个采访他的外国记者。他还记得我，想起了当年的采访，他跟我开玩笑说，当时我和您谈了一个多小时，后来您在《真理报》上怎么只字未提我呀（笑）。幽默的谈话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欧福钦认为，中国的改革对其他国家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从中国改革的经验来看，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轨道过程中，中国把社会代价降到最小。这个过程通常非常艰难，但中国避免了很多上世纪90年代在俄罗斯出现的情况。邓小平提出的改革方案中，有几点是很重要的：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使老百姓有饭吃，消除贫困，鼓励发展小型经济。第二点就是不要急于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中国的改革很成功，是用很低的社会代价换来的。欧福钦对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方针深表赞许。他说，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了解民众疾苦，提出了消除贫困、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

欧福钦对中俄两国关系前景表示乐观。他说，中俄两国领导人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互信友好

劲健，和杨祖柏、虞伟的放旷随适，总体上可称各具风貌不拘一格。十分难

能的是，这些作者虽说大都所出有本并各有师承，但在作品中所呈现的，却是食而能化的寄托于己审美理想和富有创作高度的迥别于他人的艺术菁华。当然从数量上讲，他们仅仅是上海印坛众多青年印人的典型和缩影。

篆刻创作，自是包括了诸如刀法、字法和章法在内的所有技法要素。然若相对于篆刻艺术的本体意义而言，技法之类，不过只是实践创作所需具备的必要前提。能够本质地反映作者独特思想的风格构成，才是艺术创作的至高境界和精髓所在。从这点看，为艺者能将一己创作推向峰巅的最终原因，决不是有限的技法手段和所谓过硬的基本功所致，而恰恰在于作者自身的多方修养，以及由此而生的对于作品精神内涵的准确把握，古往今来，这类例子已经很多。

沪上印坛的得天独厚之处，自然有赖于传统海派文化的丰富积淀。今日的上海，更令世人瞩目。人们有理由期待，拥有聪明才智和具有广阔创作前景的上海青年印人们，一定不会辜负这块养育自己的神圣之地，并能重铸海派文化的新的辉煌。

断，诚可谓薪火不断传承有已。其时，海上印坛多耆宿人物和莘莘学子，师生彼此授受，竟成一时之盛。时至八十年代，仅以篆刻创作的实际水准相论，上海印坛已明显位处于全国之尊。

因着海派大文化的百年沾溉之故，上海一地热衷于传统艺术的风气，历年以来，延绵持续俊彦迭出。继今年年初的“海派书法晋京展”、五月的“上海市书法篆刻大展”不久，近日，由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上海市青年文联书法家分会已经推出的与徐汇艺术馆合力举办的“上海优秀青年书法家作品展”，和这次推出的有上海图书公司共同加盟的“上海优秀青年篆刻家作品展”，便是明证。

和“上海优秀青年书法家作品展”一样，“上海优秀青年篆刻家作品展”的作者也都是经过反复遴选的十位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下的青年篆刻家。为了尽快推出新人，组委会还规定，凡在书协担任理事的作者，一律不在应征之列。此次展览集中了有如蔡毅强、高申杰和盛兰军的工细整饬，如柴聪、张炜羽及金良良的古穆安雅，如唐吉慧、陆祺伟的遒



劲健，和杨祖柏、虞伟的放旷随适，总体上可称各具风貌不拘一格。十分难得的是，这些作者虽说大都所出有本并各有师承，但在作品中所呈现的，却是食而能化的寄托于己审美理想和富有创作高度的迥别于他人的艺术菁华。当然从数量上讲，他们仅仅是上海印坛众多青年印人的典型和缩影。

篆刻创作，自是包括了诸如刀法、字法和章法在内的所有技法要素。然若相对于篆刻艺术的本体意义而言，技法之类，不过只是实践创作所需具备的必要前提。能够本质地反映作者独特思想的风格构成，才是艺术创作的至高境界和精髓所在。从这点看，为艺者能将一己创作推向峰巅的最终原因，决不是有限的技法手段和所谓过硬的基本功所致，而恰恰在于作者自身的多方修养，以及由此而生的对于作品精神内涵的准确把握，古往今来，这类例子已经很多。

沪上印坛的得天独厚之处，自然有赖于传统海派文化的丰富积淀。今日的上海，更令世人瞩目。人们有理由期待，拥有聪明才智和具有广阔创作前景的上海青年印人们，一定不会辜负这块养育自己的神圣之地，并能重铸海派文化的新的辉煌。

我第一次读《雷雨》剧本时，就很想拜见曹禺先生。然而，真正见到曹禺先生，已是15年后的事情了。

那是1993年的5月初，北京春和景明，杨花飞舞。我赴京公干。办完事后，我便抓紧时间去拜访曹禺先生。门扉叩开，开门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阿婆。她一开口就用上海话问我：“依找谁啊？”我心中一乐，笑着用上海话说：“阿婆，依是上海人。我是上海来的记者，是来拜访曹禺先生的。”

老阿婆倒是快人快语，双手一拍遗憾地说：“啊哟，曹先生最近身体不舒服，住到北京医院养病了。”

我赶忙问：“曹禺先生毛病要紧？我可以到医院去看看他？”

老阿婆听了，想了一会儿说：“格能好？我是曹老先生家里的保姆，我现在就要到医院去给老先生送小菜去。我将依的愿望告诉他。依明天早上8点半到北京医院大门口等着。说不定，运道好，就可见到曹先生了。”

没等我表示谢意，老阿婆就急急下楼，乘车走了。

次日早晨，尽管我对能否见到曹禺先生心中没底，但还是按照老阿婆的吩咐，提早一刻钟就等在了北京医院大门口。8点半还差两分钟时，我看见老阿婆从医院里走出来，老远就对我招手。待她走到跟前，还未等我开口问，她就笑吟吟地说：“今朝老先生精神好些。他欢迎依进去采访他。喏，依现在就朝里厢走，转弯角子

上，立了一个人，是老先生的秘书，他会带依去见老先生的。”

我按照老阿婆指点，走到那个转角处。果然是曹禺先生的秘书在此等候我。他热情地同我握手，并叮嘱我，为了曹老的健康，采访只能15分钟。随后，他将我引到曹老的病房里。

我一见到坐在轮椅里的曹禺先生，立刻趋步向前，向他问好。他感慨地说：“上海是我永远忘不了的城市，那里有我许多朋友。有巴金、于伶、柯灵等。他们都好吗？”

我回答说：“他们都很好。”

曹禺先生听了，高兴地说：

希特勒是用什么价值观念来获得德国民众支持的？一是用民族主义否定个体自由权利；二是用极权主义否定政治民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使战败国德国丧失了八分之一国土，十分之一人口，它的全部殖民地和国外投资都被战胜国瓜分，还要向战胜国交付巨额战争赔款。为了羞辱德国，战胜国对签订《凡尔赛和约》的巴黎和会的时间、地点进行了精心选择。地点放在凡尔赛，时间是1919年1月18日，这正是48年前俾斯麦在凡尔赛宫为德意志帝国威廉一世举行加冕、宣告德意志帝国成立的日子。战胜国以此来嘲弄德国，使德国对战胜国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复仇心理。

法西斯在利用民族复仇情绪的同时，提出了放弃自由权利的要求。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公开声称，自由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仇敌。不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对自由主义都要采取坚决拒绝的态度。在政治领域，希特勒颁布法律停止实行宪法原来规定的公民享有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信仰等基本权利。在经济领域，他制定法令对国家经济实施直接干预和全面控制。

除了用民族主义扼杀自由权利之外，希特勒还用极权主义体制否定政治民主制度。他制定了《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规定了希特勒内阁有权违反宪法，不经国会同意就可以制定法律；他颁布了《关于帝国元首最高领袖的法令》，规定总统与总理职务合二为一，希特勒为终身国家元首，其继承人只能由希特勒本人指定；他制定了《联邦改造法》和《德国总督法》，废除联邦制，实行中央集权的单一制；他颁布了《关于国家和政党统一法》，规定了纳粹党是德国唯一的政党，确立了党国合一的体制。

“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是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基石。像德意志这样一个优秀的民族怎么会推崇专制独裁的希特勒呢？性格决定命运，经历锻造素质。德国从中世纪一路走来，既没有经过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也没有经过前期以英国为中心、后期以法

国为中心的启蒙思想运动的冲刷，走的是俾斯麦强人治国这种类型的道路，缺乏深厚的自由权利和民主意识。

14—17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是张扬人的主体意识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在文学艺术方面，有诗人但丁、阿利格里、弗朗西斯·彼特拉克、乔叟等；作家薄伽丘、拉伯雷、莎士比亚等；画家乔奇·马萨乔、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桑西、乔尔乔内、提香·维切利奥、丢勒等；科学家哥白尼、培根、哈维、开普勒、伽利略等；哲学家霍布斯、笛卡尔、斯宾诺莎、伊斯兰漠等；政治学家马基雅维里；学家格老秀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莫尔；教育家夸美纽斯；等等。但在这些极富思想解放和开拓精神的巨人中，除了画家丢勒和科学家开普勒之外，却鲜有德意志民族的儿女。

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欧洲继文艺复兴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其弘扬自由民主精神的力度远远超过文艺复兴运动。著名代表人物有弥尔顿、哈林顿、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在这些启蒙思想家的行列中，也罕见德国人的身影。

观念比模式更重要，灵魂比躯体更关键。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同样不可缺少，人文素质与科学素质同样为一个民族所必需。“二战”前德国不可谓不重视教育，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实施《义务教育法》的国家。但是，在当时德国的国民教育中，职业技术素质备受重视，自由、权利平等、民主等人文素质被严重忽略。希特勒就说：“劳动大众只需要面包和马戏，他们永远不会理解理想的的意义。因此，在纳粹德国的高中，历史课主要讲授反犹主义、反自由主义等；地理课主要讲授德国人有权统治其他民族；‘种族理论课’则讲授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在大学，所有的教学内容都要突出宣传反犹主义和‘生存空间’理论，《我的奋斗》成为大学生必读的‘圣经’。在法西斯的统治下，人不是目的和主体，而成了手段和客体，一个民族正常的理性昏睡了几十年！一个民族事后的忏悔延续到了今天！”



## 危机考验民族素质

郝铁川

## 贺“上海优秀青年篆刻家作品展”

刘一闻

沪读一域的篆刻创作，有着悠久的历史。

晚近之际，各地印人多聚于此，在全国成半壁江山之势。

和海派书画创作相仿的始于清代后期的上海印坛，彼时前贤各领风骚者，大致以会稽赵之谦、石门胡鑑、安吉吴昌硕、鹤山易熹和鄞县赵时樞等为代表。所创印章之作，则基本显

现了崇尚秦汉印印、砖瓦碑碣，以及皖浙流派的总体风貌而自成体系。自上世纪三四十代起，则更有王禔、邓散木、钱崖、王贤、马公愚、方介堪、陈巨来、叶露园、朱复戡、来楚生、钱君匋和方去疾、吴朴、单晓天诸辈皆百姿百态擅胜印坛，故影响所及，岂止于上海一隅。

迨六七十年代，虽经十年浩劫沧桑之变，然刻印一门却未曾中



张炜羽



杨祖柏



虞伟

书法 孙嘉惠



## 民间小调

屠再华

我在小区公园，听到过老年人哼的一支小调：“儿子要我吃汉堡包，女儿要我吃开心果；阿婆想想真罪过，退休工资一千多，就是吃勿到过去杭州街坊奔来跑去吆喝着的——三个铜板一包的现炒热白果。”

说“三个铜板”似追溯得太遥远了一些，但老人对饮食文化每每持有一种怀旧情结。诸如馄饨担、甜酒酿担等等，不能不说这是穿梭于小巷里暖人心的一道风景。

十日谈 冬至的怀念

明刊怀念徐昌霖的文章。

## 探望曹禺

葛昆元

我一见到坐在轮椅里的曹禺先生，立刻趋步向前，向他问好。

他感慨地说：“上海是我永远忘不了的城市，那里有我许多朋友。有巴金、于伶、柯灵等。他们都好吗？”

我回答说：“他们都很好。”

曹禺先生听了，高兴地说：

“当年最早发现《雷雨》的是巴金。是他将《雷雨》推荐给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才得以发表的。”

我由衷地对他说：“《雷雨》确实写得很精彩。”随后，我向他说了，我们七位同学昼夜读《雷雨》的故事。

他听了，笑了。

接着，我还告诉他，后来我还读过他的《日出》和《原野》等剧本，还观看过《雷雨》《日出》《原野》的话剧演出或电影。

曹禺先生听完我的话后，微笑着对我说：“《日出》是我30年代在上海生活的感受。是有感而发吧。你知道吗，《日出》和《原野》的首演都是在上海。”

说完，他停顿了一下，眼睛看着窗外，喃喃说道：“我真想念上海，想念上海的老朋友啊。”

此刻，秘书俯身对曹禺先